

清代刘文蔚所编科举参考书四种及其阅读传播^{*}

马 强 才

内容摘要：山阴刘文蔚是乾隆时代乃至整个清代最为重要的科举诗赋类参考书的编辑者之一。在乾隆二十二年科举考试减判增诗以后，他应时而动，陆续推出《诗韵含英》《诗学含英》《唐人应试赋选》和《唐诗合选详解》等书，供村塾蒙学和读书士人准备应试诗赋之需。这些书籍在清代中晚期曾有多家书坊大量刊行，常见于清代中后期读书人的案头，阅读范围甚广，至今存世数量较大，为科举制度变动而影响书籍出版的典型现象。与刘氏所编之书相类，清代中后期大量版刻流传的科举参考书，反映了科举文化大背景下，知识生产和出版文化的某些特色，而要考察清代的书籍出版、社会思想文化，必须重视科举制度的影响。

关键词：刘文蔚 科举 乾隆新政 参考书 知识生产

书籍作为知识与思想的载体，产生于一定历史环境，反映彼时社会生活的诸多面貌。尤其是那些盛行一时、具有某种特色而非所谓经典的书籍，颇能折射出社会文化的一些变化和演进，追踪此类书籍的编辑出版和阅读传播，可探察社会文化背景对书籍市场的推动和调控。以书籍为视点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科举制度曾对知识生产和书籍编刊，产生巨大影响，正因为此，四库馆臣曾在“总目”中十分警惕地考评元代延祐

* 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及杭州师范大学科研启动项目(PD12002004102)“科举背景下清代浙江书籍社会史”的研究成果。

(1314—1320)复兴科举之后经学研究中的科举魅影^①。

就清代中后期书籍史来看,乾隆科举改革增加试律之后,书籍市场出现了林林总总的学诗、论诗之书,从蒙学读物到经典选本,构成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致。山阴刘文蔚,正是在此背景下应时而动,连续编纂《诗韵含英》《诗学含英》《唐人应试赋选》和《唐诗合选详解》等颇具针对性与实用性的科考应试参考书籍,成为各地多家书坊争相刊刻的对象,几可谓清代中后期最为流行的书籍之一。或许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些书籍本身并无多大学术价值,未见有学者做过专门、全面的梳理与研究,但是它们的编纂、阅读和传播情况,却集中反映了科举制度对于书籍市场的作用,也能折射出彼时读书人的知识生活状况。有鉴于此,本文考察刘氏所编诸书的编辑、刊刻和阅读情况,以揭示科举制度对书籍出版、知识生产的作用。

一、编纂过程与体例内容

刘文蔚,字伊重,又字豹君,号楠亭,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杨业荣新注《唐诗合选》书末附有绍兴鲁迅图书馆高学安所辑诸如《越声》(十二卷)、《越风》(三十卷)、《水澄刘氏家谱》等文献中关于刘氏生平的资料共六则^②,仍未足以考定其生卒年等情况。此外,[嘉庆]《山阴县志》《碑传集补》《清诗汇》(《晚晴簃诗汇》)等,载有生平事迹^③。其中,《碑传集补》卷四十五之小传、较为详尽^④。综合上述文献可知,刘文蔚家学有自,才名远播,却久困场屋,后因邓钟岳举“贡太学,誉满京洛间”,终以亲病归里,遂教授里门,“以明经老”。刘氏“称诗人于鉴湖、兰渚间”,与同郡童钰、沈翼天等人结社联吟,号称“越中七子”;与高卜亭、王皆珍等十人结为“龙山吟社”;还与钟锡圭、蒋士铨等人诗文往来,蒋氏为刘氏编《石帆山房诗选》四卷,刘氏则为蒋氏《空谷香》《藏

①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明林希元《易经存疑》一书提要,称该书“本为科举之学,故主于祧汉而尊宋”;卷十二元陈栎《尚书集传纂疏》提要,认为该书受“延祐设科”的约束而“不敢有所出入”;卷十二元陈悦道《书义断法》提要,称书前“冠以‘科场备用’四字”,盖“为科举经义而设”,内容接近清代“讲章”,乃“后来学者揣摩拟题,不读全经”之滥觞,“录而存之”是意在告诉人们“科举之学,流为剽窃,已非一朝一夕”。《总目》中,此类评述很多,表明馆臣倾向认为科举社会里的功利主义风气影响知识生产,损害著作的学术质量。如清初范芳《诗经汇诂》提要,认为全书虽六十万言,“采摭非不详赡,而本意为科举而设,于经义究鲜发明”(分别见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45、150、152、233页)。

②刘文蔚编选,杨业荣新注:《唐诗合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03—504页。

③徐世昌:《清诗汇》,中华书局,1990年,第2623页。

④闵尔昌:《碑传集补》,《清代传记丛刊》本第12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792页。

案:此文钞自《越中七子诗钞》之刘文蔚小传。

园》等题词。又有邵晋涵从之游，见于《国朝汉学师承记》^①。还有记载称章学诚曾“与之游”，但余英时考证未有其事^②。刘氏著有《石帆诗钞》八卷、《环翠轩稿》四卷，曾参与编订《越风》^③，曾任《归德府志》勘正官。

刘氏编写《诗韵含英》《诗学含英》《唐人应试赋选》和《唐诗合选》等四种科考类参考著作之事，虽未见于上述文献，却有今存文本为证。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他采辑康熙时代成书的《佩文韵藻》加以精简排列而成《诗韵含英》。书前有乾隆戊寅（二十三年）季春天台齐召南集录《文心雕龙》文句所作《诗韵含英题辞》，称“山阴刘豹君，承其父戒谋先生家学，久以诗、古文、词推重于时。今采辑《佩文韵藻》，便于初学者，为《含英》六卷”^④。

就笔者所见，该书诸本扉页题署“遵佩文斋定本”云云。书前有《例言》五则，述及编纂缘起及体例，云该书“正文字数及前后次第，俱钦遵《佩文诗韵》，校对无讹”，并说编纂动机和体例考量有三：一为克服《佩文诗韵》卷帙过于庞大所造成的价格昂贵而普通读书人无力购买的弊端；二为克服《佩文诗韵》过于厚重读书人不便随身携带之弊；三为应举吟诗作赋之人提供权威用韵之书^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该书是《佩文韵府》的精简本，保留《佩文韵府》“以韵隶事”的传统，删除故事出处，以最大限度压缩篇幅，故文聚堂藏板《重订诗韵含英》封面题曰“增订韵府提纲”。

继《诗韵含英》，刘文蔚再编成一部小型类书——《诗学含英》，以供读书人熟悉和掌握“诗材”典故。据书前署名齐召南之序，该书于乾隆二十三年编成。《诗学含英》初为十四卷，摘选《佩文韵府》，分类编排典故方面，不作注释诠释，计有如下条类：第一卷：天文；第二卷：时令；第三卷：节序；第四卷：地舆；第五卷：宫室；第六卷：君道、臣道、百官、仕进；第七卷：人伦、师友、人品、释老；第八卷：丽人、文学、仕宦、志气、人事；第九卷：游眺、庆吊、祖饯、谢惠、珍宝、服饰；第十卷：饮食、器用；第十一卷：器用（补遗）、音乐、书画、百草；第十二卷：百花；第十三卷：百谷、蔬菜、百果、树木、竹木；第十四卷：飞禽、走兽、鳞介、昆虫等四十类，俨然为一本小类书。每一类下又分若干细条目，条目之下，选取二字到五字典故，编成相对偶，合计 1045 条。部分对仗颇具巧思，可见作者精选功夫。考虑到科举用途，该书在编排之时还比较注重实用性，条目多与当时诗坛趣味相合。

①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 年，第 96 页。

②余英时：《论戴东原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5 年，第 283—289 页。

③该书成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为商盘编辑，刘文蔚参订。据蒋士铨序、商盘例言、刘文蔚后序等可知，该书前十五卷主要由刘文蔚编选，再由商盘选定；后十五卷则由刘文蔚、宗圣垣补编而成。今清华大学图书馆有藏。

④齐召南：《诗韵含英题辞》，刘文蔚：《重订诗韵含英》，紫文阁藏板，叶四。案：会文堂本《诗韵含英》题“嘉庆辛酉季春天台斋召南”，显然有误。

⑤刘文蔚：《诗韵含英·例言》，叶一至二。

紧接着，刘氏又将目光转向辞赋指南类书籍，选辑笺注《唐人应试赋选》。例言叙述该书编纂过程，云“辑《诗韵含英》”成后，即欲选注唐人应试赋，而是夏“忽撄剧疾，痊后疏懒，因循者岁馀”，至乾隆二十五年春，姚亢宗缃林“怂恿是举，遂共搜讨故实，付诸剞劂”^①，后署名“石帆山人刘文蔚识于探珠楼”。距前二书，仅隔两年而成，足见刘文蔚对于编写此类书籍，投入了较大的热情。书前有孙人龙作于乾隆二十五年孟秋之序^②，叙述该书的编纂动机及过程，言及自己“在滇南，曾选刻馆课赋，颇自嫌简略，意欲续有所选，俾体类稍备”，“阅二十馀年，究碌碌未逮”，而“石帆山人所刻《唐人应试赋选》及例言七则，凡所以公诸同好而嘉惠后贤者，至明且切”，并说刘氏“又将合宋以后并及本朝馆课诸名作，共选一编以行世”。最后，孙氏为刘氏之书“广告”：“世之学者诚欲铺张盛烈，鼓吹休明，郁郁彬彬，进而与三代同风，当奉此以为秘宝。”^③孙人龙曾寻思编纂一部可以供初学揣摩用律赋选的经历，恰好说明刘文蔚编纂该书的基本功能和市场需求^④。刘氏例言对此也有交代，他说自己见“庶常散馆必兼试诗赋”，遂考虑选唐代应试律赋及宋代、清代律赋为一编，“为后贤枕秘”。最终，先选唐人应试律赋，“分天、地、人、物为四部，部列上下为八卷。日、月、星、云之类附乎天；山、川、宫、室之类附乎地；外王、内圣之类附乎人；器用、动植之类附乎物”，“首尾完善者，得一百三十八篇”。为方便学习揣摩，于“篇后一一笺其引用之典，或原文不能全载则稍从节取，不可节则以旁注标其大旨，惟疑殆者阙之、习见者略之”，并对入选赋文，部分地做了评解，以标明其肯綮所在，“赋中之肯綮有不可不表明者，则偶识于行间，或又一得之合，读者可以隅及”^⑤。

然而，当时读书士人，最普遍关心者，莫过于科举考试律诗，对诗法指南和诗歌范本，有更为迫切的需求。这为有关试律的参考著作尤其是试律范本，留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有鉴于此，刘文蔚“斧藻群盲，总归诗囿，乃专取立唐乐府、古诗、律绝、试帖而详释之，颜以‘合选’”^⑥，编成《唐诗合选详解》，以满足自己课徒教学和市场的需求。书前有齐召南作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之序，高度评价，云：“考核典雅，注释详明，于章句间条分缕析，得其肯綮，诚足为学诗者之玉律金科。”^⑦需要说明，因所见版本不同，孙琴安和杨业荣二先生，对此书的编成时间，皆有误会。孙琴安所见为同治戊辰右文堂本，齐召南序署乾

①刘文蔚：《诗韵含英·例言》，叶二。

②据孙人龙序、刘文蔚例言，该书成于乾隆二十五年，而简宗梧、游适宏《清人选唐律赋之考》误以为该书编刻于嘉庆元年（《逢甲人文社会学报》2002年第5期，第28页）。

③孙人龙：《唐人应试赋选叙》，刘文蔚：《唐人应试赋》，清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叶二。

④孙人龙本人亦是此类初学文翰指导类书籍的编撰者，曾有《杜工部诗选初学读本》刊刻行世，其自序末署“乾隆丁卯（1747）百花生日壬申苕上孙人龙记于端溪试院”。

⑤刘文蔚：《例言》，《唐人应试赋》，清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叶一至二。

⑥⑦齐召南：《序》，刘文蔚编注：《唐诗合选详解》，金玉楼藏板，叶一。

隆丁未(1787),并据之以为该书成于此时^①。然笔者所见,序末多署乾隆甲申(1764),更符合刘文蔚的生平,故成书时间与《唐诗三百首》(乾隆癸未,1763)相当。又,杨业荣新注《唐诗合选》所用底本(清末民国初年石印本)“未署作者姓名,亦无写作年月”,故杨氏根据序中所言“丁丑春特允廷臣条奏乡会场以诗”云云,错判该书编成于“乾隆二十二年春”^②。

具体内容方面,《唐诗合选详解》选编唐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五言排律等七类诗作,并于每类选诗前,选辑前人论诗文字,基本目标是为这些体裁的诗歌创作提供具体的写法指南。律诗,甚至排律,在《唐诗合选详解》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篇幅,成为选本的重点,显示出该书是为士人准备科考律诗而编。

二、版刻发行与阅读流传

《诗韵含英》系精缩《佩文韵府》而成,本身并无多大学术价值,然就出版流传情况来看,很快就海内风行。乾隆五十八年正月,裘师轼作《诗韵含英异同辨序》,称该书“流播广远,海内争购之,盖数十年”^③。稍后,嘉庆八年(1803)七月,泰华楼本《诗韵题解》之“例言”,评价称“《诗韵含英》一编,流播海内,久为应举善本”^④。由此来看,齐召南《唐诗合选详解·序》所言“山阴刘豹君以凤学伟才,辑《佩文韵藻》”,编辑成“便于初学者”的《诗韵含英》十八卷,“一时盛行,纸价倍贵”^⑤,洵为实述。

我们可从《诗韵含英》的大量刊本,推知该书当时颇为流行。就笔者耳闻目见(包括网上资源),该书尚流传至少有六十多种刊本,而当时的刊行机构,自当更多,可谓洋洋大观。这些刊本,就题名而言,主要有三种,即《诗韵含英》^⑥、《重

①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70页。

②刘文蔚编选,杨业荣新注:《唐诗合选》,第7页。

③裘师轼:《诗韵含英异同辨序》,《重刊诗韵含英·附诗韵异同辨》,宝林山房吴氏道光甲午(1840)刊本,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叶一。谷乔编辑:《增补注解诗韵含英异同辨》,1879年和刻本,叶一。

④甘友兰:《诗韵题解·例言》,泰华楼刊本,叶一。

⑤齐召南:《序》,《唐诗合选详解》,金玉楼藏板,叶一。

⑥笔者知见版本有(因出版年代颇多不详,故排列不分先后):(1)探珠楼本;(2)金溪两仪堂梓行,乾隆年间刊;(3)嘉庆五年(1800)世德堂新镌;(4)嘉庆辛酉(1801)会文堂刊本;(5)嘉庆八年(1803)镌忠恕堂梓;(6)嘉庆丙子(1816)新镌英德堂藏板;(7)道光辛卯年(1831)六有斋刊;(8)道光乙巳(1845)英德堂藏板;(9)光绪六年(1880)扫叶山房新镌;(10)金溪四友堂梓;(11)衡阳致远堂梓、三让堂藏板;(12)金溪大文堂;(13)金陵松盛堂梓行(题署汝显堂梓、松盛堂重梓本);(14)北京宝文堂本;(15)金谷园梓;(16)友于堂;(17)元茂堂本;(18)成文堂;(19)义经堂本;(20)公志堂梓行;(21)达道堂本;(22)本堂藏板;(23)老会贤堂藏板;(24)黔安甘至宝堂校刊;(25)玉兰堂藏板;(26)五桂楼藏板;(27)贵文堂梓;(28)文奎堂梓行;(29)经元堂藏板等。

订诗韵含英》^①和《校正诗韵含英》^②;就出版时间而言,《重订诗韵含英》,大约出现于乾隆后期,《校正诗韵含英》则大约出现于光绪年间;从卷数来看,主要有两种:十八卷本和六卷本;从装订册数来看,有两册和四册者。

在《诗韵含英》近三十种笔者知见之版本中,探珠楼、世德堂、英德堂、文德堂、友于堂、贵文堂、会贤堂、金匱巽记、五桂楼、扫叶山房等,版式基本一致,字体相仿,属最为流行者。《重订诗韵含英》版式最为流行者,如书业堂、世德堂、文德堂、合志堂、集元楼、务本堂、两仪堂、金陵四教堂、善成堂、大盛堂、敬文堂、松盛堂等,基本同于前述《诗韵含英》的流行版式,即行、字数,甚至字形,往往保持一致。这似乎表明,各地书商有意遵从一种约定俗成的“典型”版式,以获得市场认同。为求相似,有些版本采用覆刻,如敬文堂本《诗韵含英》文字笔划,相对于其他版本,显得更为拙劣和倚斜。又如,文盛堂、务本堂《重订诗韵含英》与两仪堂本《重订诗韵含英》文字相似,然前两者文字笔划缺少笔锋,显系晚成,甚或覆刻两仪堂及其相似版本。有些则采用摹仿,如光绪六年扫叶山房本《重订诗韵含英》,较之他本,文字笔划更为夸张,或为仿样而成。又如金谷园《诗韵含英》版式,与他本相似,部分文字用行楷,当属依仿。又如,道光乙巳英德堂《诗韵含英》,序言文字,相对其他相似版本,更为扁平,亦属依仿。惜乎大部分版本,刊刻时间未详,又阙佐证材料,无法确定各本之间的前后承继关系。

《诗韵含英》很快就有增补完善者,出现了《诗韵含英题解》(也有题“诗韵题解”)^③、《诗韵含英辨同》^④和《诗韵含英异同辨》^⑤等。《题解》为甘友兰所作,成书于乾隆三十九年;《辨同》旧题彭元瑞所作,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异同辨》题“南昌彭元瑞原本,萧山任以治、蔡应襄同辑”,版式上正文为刘

①笔者知见版本有(因出版年代大多不详,故排列不分先后):(1)蔚文堂乾隆丁未夏(1787)镌(扉页题“采典仍照原编,平仄区分两类”,为各版题此之始);(2)乾隆五十八年(1793)京都文锦堂校刊;(3)嘉庆廿二年(1817)崇文堂藏板;(4)金陵世德堂藏版(嘉庆版);(5)光绪年间海阳维新堂梓行;(6)金匱巽记藏板(扉页题“旌邑汤湘浦刊”);(7)金陵致和堂癸丑年新镌;(8)锡山敬文堂藏版(扉页首端题“崇祯壬申新镌”及“姑苏会文堂藏本”);(9)文聚堂本(有两种,一种书名“诗韵含英”,扉页题“重订诗韵含英”,一种书名“增订韵府提纲”,扉页“重订诗韵含英”,实为一种);(11)文英堂梓;(12)元茂堂梓;(13)集元楼梓行;(14)务本堂藏板;(15)成文堂梓;(16)上洋紫文阁藏板;(27)元聚堂梓行。(18)书业堂本;(19)松盛堂梓行;(20)聚文堂藏板;(21)文德堂梓行;(22)合志堂藏板;(23)金陵四教堂藏板;(24)大盛堂藏板。

②1922年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校正诗韵含英》。

③笔者所藏刊本,年代不详,正文印刷《题解》而天头一栏附《异同辨》。

④今有文星堂、聚文堂、耕南小舍重校和道光甲辰永富堂梓等本,书前有“乾隆五十八年岁在癸丑春王正月日会稽裘师轼书于嫏嬛书屋”之序,强调此书有助于初学和作诗赋。

⑤今有光绪五年(1880)铜版线装本。

文蔚原文、上有一栏印辨证语。在这三种书的基础上，再衍生出整合编辑之书，有《诗韵含英辨同题解》^①和《诗韵含英题解辨同合刻》^②，后者最为常见，正文用刘文蔚原著，上辟一栏，补充校正刘氏之缺失，实将《诗韵含英题解》与《诗韵含英异同辨》合刊，书序强调能为准备科考诗赋者提供参考^③。“合刻”亦有增订者，有福省灵兰堂《增订诗韵含英题解辨同合刻》。还有将三种增补本统合者，如三让堂道光乙未（1835）新镌《诗韵含英题解合璧辨同》。

《诗韵含英异同辨》很快东传日本，今有文化十三年（1816）春三月“乌山侯藏版”本，以及文化十四年津轻弘前藩旧士族宅本，皆为翻刻。其后，至少还有六家刊本：（1）《诗韵含英异同辨》，日本嘉永七年（1854）秋“三刻本”；（2）冲冠岭编《掌中诗韵异同辨》，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3）《增补注解诗韵含英异同辨》（十八卷），署（明）刘文蔚辑、（日本）谷乔增补编辑，有日本明治十二年初刻本、明治四十三年、大正八年（1919）再版本；（4）明治十三年吉冈保道编、东京有则堂发兑《增补头字诗韵含英异同辨》；（5）吉冈保道编《诗韵含英异同辨》，布面线装乾坤两册，尚古堂明治二十六年出版；（6）《词林典类·增订诗韵含英异同辨》，近藤原粹增订，日本明治二十六年五月嵩山堂刊本；（7）大冈让校正、浪华书肆、中川明善堂藏板的《诗韵含英异同辨校本》。这些版本，多以活字印刷，装帧越来越精。

就现存本而言，《诗学含英》的流行程度当不亚于《诗韵含英》。齐召南《诗学含英序》强调“类书”不可或缺，可积累诗材，“以助吟咏”^④，而刘氏该书，正是照顾到当时读书人市场的此类需求，所以颇受欢迎，有多家书坊竞相刊行，流传至今的版本多达六十多种，刊刻数量大，出版机构广，折射出清代中后期人们对于诗材类书籍的普遍需求。《诗学含英》的现存版本，大致可据题

①嘉庆八年（1803）泰萃楼板为最早，后有近贤堂嘉庆二十二年《诗韵含英题解辨同合刻》、聚元堂道光甲辰仲春（1844）重镌《诗韵含英题解辨同合刻》、道光甲辰永富堂梓《诗韵题解辨同》、六星堂藏板《诗韵含英题解辨同》、六顺堂藏板《诗韵含英辨同题解》（封面题“诗韵含英题解”）、源盛堂藏板《诗韵含英辨同题解》。

②笔者知见版本有（因出版年代大多不详，排列不分先后）：（1）英德堂嘉庆八年（1803）刊；（2）文锦堂嘉庆九年仲春重镌；（3）敬文堂嘉庆九年仲春重镌；（3）致盛堂道光辛巳（1821）新镌；（4）文德堂道光三年（1823）新镌本；（5）万元堂道光七年新镌；（6）道光七年芥子园新镌；（7）合盛堂道光九年新镌；（8）崇顺堂道光丁未（1847）仲春重镌本；（9）英德堂本；（10）务本堂本；（11）文玉堂重刊；（12）近贤堂藏板等。

③④《诗韵含英题解辨同合刻·序》，文德堂本，叶一。

目、装订卷册数和内容略作区分：从命名来看，主要有《诗学含英》^①、《重订诗学含英》^②、《增韵诗学含英》^③、《增订诗学含英》^④和《校正诗学含英》^⑤等；从卷数编排和装订册数而言，主要有十四卷四册本、目录十四卷实际合为四卷二册本；从内容来看，该书分为三类，一为刘文蔚初编本，二为增订本，增加部分五言对句，三为增韵本，将《诗韵含英》精简附录于天头并增加部分典故^⑥。《诗学含英》也东传日本，产生了广胖堂刊本。

与《诗韵含英》一样，《诗学含英》大量版本之间，也有一些相似特征。概括而言，《诗学含英》版式最为流行者有二：第一类，以尚德堂、文奎堂、文富堂

①笔者知见版本有（因出版年代大多不详，排列不分先后）：（1）启元堂梓行（山阴刘豹君原本、星沙张晴峰校订，乾隆乙卯岁）；（2）嘉庆辛酉（1801）会文堂梓行；（3）文贤堂嘉庆二十四年（1819）新刊；（4）黎照书屋光绪己丑年（1889）刊；（5）光绪庚寅年（1890）新刻镐京经畲斋藏板（内署陕西西安府崇云阁藏板）；（6）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仁记书局刻本；（7）光绪年间联墨堂刊本；（8）宝文堂本；（9）三元堂藏板；（10）令德堂刻本；（11）经纶畲记刻本；（12）文光堂本；（13）四友堂梓本；（14）裕德堂刊刻本；（15）宝庆府尚德堂刻本；（16）吴兴八杉斋校本；（17）经纬堂刊本；（18）文富堂本；（19）学源堂本；（20）聚文堂藏板本；（21）文华楼本；（22）聚文堂藏板本；（23）松盛堂藏板本；（24）赣州本立堂藏板本；（25）英德堂藏板本；（26）宝文堂本；（27）和宁堂藏板本；（28）裕德堂刊刻尚德堂藏板本；（29）文光堂藏板本；（30）敬书堂本；（31）郁文堂梓《学源堂诗学含英》。此外，内容相同而题名有异者有：（1）桂林堂道光甲申（1824）仲春刻《诗料备览——诗学含英》；（2）文秀堂藏板《诗学含英“诗料备览”》；（3）六有斋道光辛卯（1831）新镌《分类诗学含英》，亦是如此。

②笔者知见版本有：（1）道光八年（1828）新镌日光堂藏板本；（2）文光堂刻本；（3）英德堂藏板本；（4）致盛堂本；（5）三元堂藏版本；（6）经元堂藏板本；（7）崇发堂本；（8）同文会藏板本；（9）天宝楼藏板本；（10）英德堂藏板本；（11）务本堂藏板本；（12）澹雅堂藏板本；（13）映墨堂藏板本；（14）致远堂藏板本；（15）宝庆府经文堂藏板本；（16）复记安定堂藏板本；（17）宏道堂藏板本；（18）光绪甲申（1884）上海扫叶山房藏板本；（19）上海铸记书局本己未（1885）暮春本。

③该书由向熹增辑，将《诗韵含英》精缩印于天头上，笔者知见版本有：（1）霞漳向熹增、灵兰堂梓行本；（2）道光五年（1825）宝仁堂刊二节楼本；（3）道光八年（1828）宝仁堂梓本；（4）道光辛卯（1831）新镌六有斋梓本；（5）道光丙申（1836）万元堂藏板本；（6）六有斋道光辛丑（1841）新镌本；（7）道光年间裕文斋梓本；（8）光绪十年甲申（1884）镌、藜照楼藏板本；（9）文兰阁藏板本、萃文堂发兑。此外，双门底儒林阁光绪九年癸未（1883）镌《新增诗学含英》也属此本系统。所谓“重订”者，当自星沙张正旭（号晴峰）乾隆丁卯（六十年，1795）校订本始。

④有二本：（1）文光堂藏板《增订诗学含英》；（2）上海扫叶山房藏板、光绪甲申春校刻《增订诗学含英》。

⑤此书为民国时刊本，有上海广益书局、新兴书局等影刊。

⑥此外，民国时嘉义蔡清福增补题为“诗材增补篇”，有“斗草”等六十四条，在体例上已经突破了刘文蔚原编，主要排列五言、七言对句。

和本立堂本为代表,版式基本相近,序言文字皆为楷书;第二类,有文秀堂、郁文堂、敬书堂、盛德堂、聚文堂、文贤堂、聚盛堂、大雅堂和经畲斋本,版式相近,序言用宋体。《重订诗学含英》流行版式有四:第一类,以文光堂、英德堂为代表,同于《诗学含英》第一种流行版式;第二类,以同文堂、经文堂本为代表,同于《诗学含英》第一种流行版本;第三类,以宏道堂、安定堂、经纶畲记、同文会、崇发堂本为代表(包括扫叶山房《增订诗学含英》),版式近似,序言、体例皆用宋体刊印;第四类,以三元堂、天宝楼本为代表(包括儒林阁《增订诗学含英》、六有斋《分类诗学含英》、六有斋《增韵诗学含英》、宝仁堂《增韵诗学含英》),版式相似,序言用行楷书写。由于这些流行版本,大部分没有明示刊行时间,只能根据印刷质量和字体等因素,大致确定某一版本当属晚出。如文光堂《重订诗学含英》文字大小不齐,笔画曲折,似为第一类版式中的覆刻者。又如,儒林阁《新增诗学含英》,序言的行书,行笔拙劣生硬,当为《重订诗韵含英》第二类版式的仿刻者。由于缺少文献支撑,很难判断相似各本之间的承继关系,只能据此推断当时各家书坊为了牟利,将目光瞄准畅销书籍,缺乏版权专利意识,多依仿刊刻流行书籍的流行版本。

《唐人应试赋选》的刊本,今存不多,有扬州大学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所藏探珠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本,当为初刊(原因详后)。此外,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亦为少数现存刊本之一,然刊刻者不详。

就今存版本数量来看,《唐诗合选详解》比《唐人应试赋选》要流行得多。今存二十馀种,虽版本源流情况已不可考,但就版式而言,多类似相近。就诸本书名来看,主要有三种:《唐诗合选详解》^①《重订唐诗合选详解》(至晚从嘉庆十年[1805]三让斋本开始)^②和《增注唐诗合选详解》^③。从内容和卷数排列来看,该书有两种,一者为十二卷六册,一者为八卷两册,后者似乎是石印兴起后方出现,年代较晚。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产生了境外刊本,有越南嗣德二年(1849)八月中浣长文堂新刊正者,其封内则题署“美文堂藏板唐诗合选详解”及“五云楼本正”、“刘先生注释”等。杨业荣在新注《唐诗合选详解》之时,以

①今存刊本有:(1)乾隆年间启元堂刊本;(2)嘉庆元年(1796)石竹山房重刊本;(3)嘉庆元年周令德堂藏板本;(4)嘉庆元年尚德堂藏板本;(5)裕德堂道光九年(1829)重刊《唐诗合选详解》;(6)同治元年(1862)佛山宝翰楼藏板本;(7)同治三年(1864)新锓、禅山金玉楼藏板本,扉页发兑章云“姑苏原本”; (8)同文堂发兑、右文堂藏板、同治戊辰(1868)新镌本;(9)光绪己卯(1879)春广州以文堂梓行本;(10)光绪十一年(1885)经文堂梓本;(11)光绪十六年(1890)诒经堂藏板本;(12)益元堂藏板本;(13)麟书阁藏板本;(14)双门底芸居楼梓本;(15)粤东英文堂本;(16)粤东编译公司石印本;(17)广州石经堂石印本。

②笔者知见版本有:(1)苏州三让堂《重订唐诗合选详解》嘉庆十年(1805)新镌本;(2)四教堂《重订唐诗合选详解》,书口印有“启元堂”字样。

③今有《石印增注唐诗合选详解》,最初的刊刻者不详。

为“在清人选辑的唐诗选本中”，刘氏此书的流行程度，仅次于孙洙所编《唐诗三百首》^①。此绝非夸大之词，就存本数量及当时的版刻情况来看，确乎流传甚广，至清末民初仍有广泛出版，在清代后期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就目前各本来看，《诗韵含英》和《唐人应试赋选》，皆有“探珠楼”本，且刘文蔚及其子所居为“探珠楼”^②，故而我们可以推测，刘氏所编四种书籍，或皆为家刻初刊。之后，各地书坊或盗版翻刻，或增补重刊，流传渐广。如金谷园本《诗韵含英》，刊行时间为乾隆二十三年，翻刻何等迅速！这些书坊，除了江、浙、闽、赣书坊密集之处，还分布于北京琉璃厂、广州双门底、陕西西安、四川阆中、湖南衡阳、广西桂林等地，可谓东西南北，跨度甚广。其中，广州书坊，勃兴迅速，数量较多，尤引人注目。此外，还有《诗韵含英》《诗学含英》和《唐诗合选详解》由同一出版机构刊行者，如三让堂、灵兰堂、启元堂、文贤堂、广益书局等书坊，就曾连续且几乎同时刊行。这似乎说明，此时社会缺乏有效的版权保护机制，很多书坊围绕此类科举参考著作来安排经营，为利所驱而罔顾同行的专利之权。由此也可以看出清代后期的出版史情况，尤其是面对一些较为流行的读物，似乎各家出版单位在激烈竞争、抢占市场。

三、科举制度与知识生产

除《唐人应试赋选》外，刘文蔚所编《诗韵含英》《诗学含英》和《唐诗合选详解》等三种有关诗学的科举参考书，流行百馀年，刊刻机构遍布大江南北，产生了多种翻印覆刻本，直至民国初年仍在刊行流传，加之大量的增补续编本，可谓清代后期出版界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刘文蔚之所以孜孜以求，短时间内连续推出四本科举参考书，其推动力量当为科举考试诗赋而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前引《诗韵题解》的“例言”，即明言此类书籍的性质为“应举”而作。

清代初期，沿用明代旧制，以八股文取士，读书人对于诗赋多不重视。及至康熙十七年（1678），为克服八股考试之弊，“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③，遂诏谕开博学鸿词科。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召试体仁阁，试赋、诗各一，乾隆元年（1736）再召试博学鸿词科，所试内容仍为诗、赋^④。康、乾二朝还多次举行“巡幸召试”，考试内容也多为诗、赋。一些著名士人借

①刘文蔚编选，杨业荣新注：《唐诗合选》，第1页。

②《唐人应试赋选》刘氏自序署曰“乾隆二十五年岁在上章执徐律中林钟之月石帆山人刘文蔚识于探珠楼”，而刘文蔚子传锦著有《探珠楼诗草》，由此可知刘氏所居名“探珠楼”。

③张寿镛辑：《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三十七，求实书社板，第1页。案：康熙十八年三月，召试体仁阁，“赐燕，试赋一、诗一”（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〇九，中华书局，1976年，第3176页）。

④《清史稿》，第3176页。

文学而得选，甚至得选内阁，朝廷重视“学问渊通、文藻瑰丽”的选人趋向，得以充分彰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诗赋之学复兴。

更为关键的是，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科举改革，第二场考“五言八韵诗一首”^①，乾隆二十五年诏令科考正式增加律诗，乾隆四十七年将第二场排律诗移置头场时艺之后，并诏令要求与第一场并重^②。响应考试指挥棒，士人对于诗学入门之书的需要，变得更为迫切，出版市场受此鼓动，迅速推出大量与学诗有关的声韵、诗材和诗学类著作^③。

此外，清代庶吉士散馆多试以诗赋的进士再培养制度，同样刺激读书人重视诗、赋类著作，带动相关参考书籍大量出现。清初沿明制，设庶常馆，殿试之后，选德才兼优之士为庶吉士，入馆学习，名为馆选。庶吉士在馆三年，学习满文、翻译及汉文之经史、词、诗等，期满由庶常馆教习奏请皇帝“御试”，分发任用，称为“散馆”^④。散馆所试，“有制艺、有论、有诗、有赋”^⑤。

博学鸿词科考试诗赋和科举改革增加律诗一首的政策^⑥，对士人的阅读内容，产生了巨大影响，迫使他们将目光和精力部分地迅速转而投向与诗赋之学有关的著作之上，尤其关注与律诗创作相关的学问。出版市场也随之发生转变，与辞赋和科举律诗相关的选本、诗法、诗学、诗材和诗韵著作大量出现，诸如《诗韵含英》《诗韵集成》《佩文诗韵释要》等根据《佩文诗韵》加以改定的小型韵书、诗材类书籍和经典选本，就成为读书人案头常备书籍而流行一时。

刘文蔚瞄准科考参考类书籍的市场之需，于乾隆二十二年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之后，迅速编定用于初学写诗的三本参考著作，为初学者提供音韵声律、对偶用典和诗歌范本等较为全面的参考资料，其中《诗韵含英》主要是为方便

①乾隆科举改革的内容：二十二年“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四十七年“移置律诗于首场试艺后，《性理》论于二场经文后”（《清史稿》，第3148页）。其后，清代科考内容长期稳定下来。又，各级科举考试，虽然都试五言律诗一首，但体裁略有区别，即“童生及秀才科、岁考，皆用六韵，科场则用八韵”（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第3页）。

②有关制义和律诗的重要性，社会反响和认识，可从《新注韵对千家诗·序》见出，序云：“自令以八韵取士，海内学者，蒸谈向风，莫不户诵家弦，谐声振采矣。盖八韵，固与八比同重也。而其长而用之，童而习之，则亦与文无异。”（德和堂甲寅孟冬镌本，叶一）

③参见拙文《清代补续〈事类赋〉著作考略——兼说清代科举政策对“诗材”类著作出版的影响》，《汉学研究》第三十卷第三期，2012年，第212—216页。

④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六“庶吉士散馆”云：“每科新进士，选若干人为庶吉士，入馆教习禁体文字，三年有成，量材授职。若遇恩科，则不待三年即行授职，盖又有新科之吉士入馆矣。授职之例，入选者，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不入选者，内用主事、中书，外用知县。”（中华书局，1984年，第134页）

⑤张廷玉：《同馆课艺序》，《澄怀园文存》卷九，清乾隆间刻《澄怀园全集》本，叶四至五。

⑥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卷四《学校门》，道光十二年吴氏筠清馆刻本，叶五。吴氏转引自《清会典》之《礼部·应试程式》。

作诗写文用韵查字,《诗学含英》则主要是为完成律体等诗歌检寻用典和练习之用,《唐诗合选详解》为初学者提供最好的范本和某些常见题材的借鉴对象。考虑到科举坎坷者可能有机会通过献赋而登上仕途,已得功名者为了歌功颂德而创作辞赋之需,及应付清代庶吉士选拔考试,刘氏还编写了律赋范本——《唐人应试赋选》。上述四本著作,皆为针对乾隆朝增加律诗考试及清廷进士再培养考试而编,显示出编者对于市场需求的全面迎合,将初学诗之人和力图步上科举仕途之人的需求置于首位,自能成为当时流传广泛的土人学习参考书。

在科举考试制度的带动下,知识生产中的很大一部分社会力量,专注于应试参考书籍的编写传刊。可以想见,若无科举应试需求的市场驱动,《诗韵含英》《诗学含英》和《唐诗合选》就不会产生大量“增订”之本,也不会有那么多书坊加以刊刻。这提示我们在研究彼时社会的流行书籍之时,须关注科举的指挥棒效应。如《唐诗合选详解》共收诗368首,其中与《唐诗三百首》不同者凡270余首,杨业荣在比较两者之后,认为刘文蔚“十分注意政治和艺术的统一”^①,但却“不当地”选择了一些“应制”诗作^②。杨氏的批评,忽略了此书针对科考需要而编纂的动机,未能做到同情理解。

商衍鎏曾言自明至清,科举参考书籍“汗牛充栋”,但“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停科举、废八股后,零落散失,覆瓯烧薪,将来欲求如策论、诗赋之尚留于世间、入于学者之口,恐不可得矣”^③。此类书籍,反映了清代科举制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并启发我们思考书籍的定义到底应该如何。如乾隆中后期出现的杜诗书籍,有为诗歌启蒙而编,内容简单而侧重诗法,往往不副“杜诗学”之名^④。看来,曾经盛行的与后世留存的,并不一定与各个时代的实际价值必然成正比。这恰好告诉我们,今天大量盛行的高考指南类著作,其价值和功用应该如何看待,很多年以后,它们也许会成为反映此时社会文化思想的活化石,折射出人们曾经有过知识活动。通过此类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参考书,我们可以猜知当时不仅读书人,还有塾师、书商等等,曾将大量精力,花于应试参考知识的生产之上。

【作者简介】马强才,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国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和现代学术史。

①②杨业荣:《前言》,《唐诗合选》,第3页。

③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27-228页。

④参见拙文《科考律诗新政与清代中后期杜诗学的新变》,《中国诗学》第十七辑,第153-160页。